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现代性及其实践转化

◇ 蒋占峰 苏东阳

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现代性出场

(一) 民族国家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实践场域

17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民族国家政治革命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率先开启了现代化之路。借助先发优势,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现代化“出谋划策”,然而实践环境的转换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不可能简单复制西方道路,它为党的革命精神提供了既有世界普遍性又有民族特殊性的生成、发展和转化的中国场域。

这个场域有以下几方面维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规定了党的革命精神的理论空间;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工业化道路决定了党的革命精神的经济基础;巩固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领导地位规划了党的革命精神的政治边界和价值导向;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形成了党的革命精神的制度框架;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了党的革命精神的文化载体等。这些维度在生成党的革命精神实践场域的同时,又不断被党的革命精神所渗透、升华,它们在相互交织中勾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叙事,而社会主义现代性就是这篇宏大叙事的中心思想。

(二) 社会主义现代性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内容底色

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回答有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一系列重大问题中不断开拓中国化现代性理论新境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群众路线,将资本逻辑建立于人民逻辑的基础之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同时力争外援直至开放合作共赢,冲击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格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初心使命,使党牢牢掌握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领导地位。新时代,我们党提出“中国梦”“一带一路”“美好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连接理想与现实、融合民族与世界的中国方案,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导人类文明朝着更加和谐、美好、正义的方向前进。

其蕴育的革命精神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中革命性与保守性、社会性与自利性的内在矛盾和悖论,具有更为独特、广泛、真实、进步的社会历史意义。故而在中国语境下,现代性既具有崇尚理性、主体性、科学性、民主性、规范性等共性内容,同时又超越了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资本至上观念,力求规避和抚平其带给现代社会的悲怆和痛苦,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组织机制中,形塑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精神,从而构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内容底色。

(三)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统一于中国社会实践

百年来,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社会革命实践中创造、赓续的伟大革命精神,始终体现着这种实践理性,不断启蒙、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投身于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也因为这种实践理性,党的革命精神才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规划原则、方向与目标,使之跳脱“历史的终结”与盲目,而这一进程也使党的革命精神扎根于中国社会革命实践沃土,免于沦为纯粹文化批判的浮萍。

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现代化指向

(一)以革命精神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性

现代化过程意味着人类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过渡。大规模的工业化、城镇化一方面推动了我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大量生产、大量污染、大量消耗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和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生态问题。综合来看,这些问题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生态文明精神在个别地方和党政部门中淡化、缺位使然。生态之为文明,不仅意味着绿水青山、环境美好,更意味着我们党始终把实现生态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性精神建构协同推进,把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革命精神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题中之义。

如果没有现代性革命精神的引领,只是专注于片面的经济发展,那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目标就会失去精神支撑、生态支撑。新时代,我国“生态环保任重道远”,需要将党的革命精神中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建设,坚持新发展理念,引导美丽中国建设,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性。

(二)以革命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平衡性

现代化进程中,以往规制人们社会交往的利益格局、道德理念和制度规范遭受严重冲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分歧失衡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发展失衡是物质利益失衡,也是精神利益失衡,而精神上的分歧失衡反过来还会扩大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物质生活差距与发展鸿沟。由于党对国家事业的全面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这些分歧失衡现象具有非对抗性、渐进性和可控性的特点,但若任由其发展加剧,不仅与党的初心使命背道而驰,还会割裂人们之间和谐友善、团结互助的精神纽带,严重消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向心力、凝聚力。

如前所述,党的革命精神从一开始就是实现中国社会整合、把中华民族团结起来的有力武器,我们党在各个时期始终强调通过维护和发展人民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画好最大的同心圆,从而超越分歧、形

成共识,在综合平衡中实现发展进步。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党更是将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作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关键,这都是党的革命精神中实事求是、团结一心、公平正义、执政为民等现代性特质的具体体现。

(三)以革命精神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性

现代性带给人类以理性精神和自身价值的极致展现,但也容易在对传统性人格的矫枉过正中使个人精神世界走向反面。

身之主宰便是心,人对世界的能动关系离不开精神意志的坚强和主动。历史证明,我们党坚守理想信念、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帮助人们捍卫自身主体性、树立精神自信与民族自信、抵御资本侵蚀、驾驭资本逻辑的精神之“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既前景光明,又充满挑战,只有坚持并弘扬党的革命精神,我们才能够规避和战胜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人精神世界的负面侵袭,才不会在前进征程上被狂风巨浪吓倒、被重重困难压垮,才能不断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实践转化

(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实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理论创新

精神和理论之间既有意识形态的同质性,也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论分野和实践关联。革命精神在现代化实践中有待继续深化为科学理性的现代性理论,由革命精神的感性认识达到现代性理论的理性认知,是推动革命精神向现代化实践转化的重要飞跃。

长期以来,西方现代性理论囿于纯粹文化批判的误区,逐渐失去了对世界现代化实践的引领作用。因此,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矛盾和现实问题。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迸发的人的主体性和多元性,既是现代化的源动力,也是造成人民内部各方面需求和发展能力差异的现代性根源,这使得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在创新能力、城乡区域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发展任务艰巨。

面对这些重大问题,必须大力发扬我们党重视

学习、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坚持“两个务必”的作风和“赶考”精神,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高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和研究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做到有的放矢,并善于将重大的现实问题转化为理论命题,进而将对重大理论命题的回答和解决升华为学术性、体系化的理念、方法和话语,把朴素的革命精神转化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只有在这个过程中,党的理论才能同我国具体实际和时代要求紧密结合,实现从蓝图到现实的实践转化。

在理论创新中,我们还要高度重视资本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作用,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探索、生成、完善过程,就其本质而言,是利用资本、规范资本、驾驭资本、超越资本”。也就是说,要认真研究、掌握和运用新时代资本运动的新特点新规律,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的前提下,把资本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将其无序扩张性驯化为推动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的动能,从而使其成为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形塑现代性公民的有利工具。

(二)推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成就是依靠人民创造、发展起来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革命精神就会失去实践主体与价值依托。但是当今社会,背离党的宗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党内依然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等问题会破坏党的执政根基、加剧社会的分歧失衡,如果放任不管,还会严重破坏党的革命精神的群众基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就是中国精神的最集中体现,也是凝聚各族人民大团结这个中国力量的精神纽带。党的革命精神之所以拥有磅礴的实践伟力,离不开其始终坚守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新时代,如何继续坚守和传承这个价值理性是夯实党的革命精神的人民根基、使革命精神充分转化为中国力量的重要课题。

首先,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向更高层次和发展阶段迈进,人民群众需要更公平、更高质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以“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不断调适和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标准,以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变轨人民需要的实现路径,持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全面发展水平,是党的革命精神应始终遵循的基本要求。

其次,必须充分发扬人民的主体性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智慧,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人民离得最近,也体会得最深。人民群众中积蓄着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就是新时代人民主体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最新生动展示。人民中迸发的智慧和力量是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必须倍加珍惜。

再次,要发挥好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创新群众路线这个党的传家宝。基层协商民主是践行党的革命精神中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现代性价值的重要渠道,要将协商规范化、制度化,通过“民事、民议、民决”“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促进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发挥;疏通自下而上的协商民主过程,贯通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把人民民主建立在协商民主和过程民主的坚实基础上,增强党的革命精神与人民群众的现代性融合。

(三)实现革命精神的大众化与社会化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是通过制定和执行一定的策略方针来贯彻其革命精神的。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党的革命精神在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中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的同时,也面临多元的社会思潮挑战、市场经济逐利性冲击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污名化攻击,当下,党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展现的伟大抗疫精神也遭受着反华势力的恶意污蔑。思想上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威胁着党的意识形态阵地,因此必须采取正确的策略方式使党的革命精神大众化、社会化。

一是把正面宣传灌输和日常实践养成结合起来。利用教学培训、红色旅游、大众传媒等正面宣传教育增进人民群众对党的革命精神主要内容和相关历史的了解,这有助于人民群众建立相关基本认知和价值判断。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党的基层组织应领导并依靠群众化解日常生产生活的问题与矛盾,使党的革命精神渗入人们日常生活,在知与行的结合中深化为群众认同。

二是把软性的文化涵养和硬性的制度规范结合起来。当前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使得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培育党的革命精神的肥沃土壤,应大力发展弘扬“三大文化”、契合人民需要的文艺作品和文化活动,利用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现代信息传媒讲好革命历史、宣传英雄模范,使党的革命精神犹如空气般充满人们的精神世界。同时,制度是政策的规范性延伸,要健全和完善各领域各层次相关制度体系,构建弘扬和践行党的革命精神的现代化治理模式,使之融入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之中。

三是把斗争精神和团结精神结合起来。斗争精神是党的革命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歪曲否定党的历史的言论和反动思想的渗透,既要敢于揭露和批判,又要掌握斗争本领和斗争艺术,善于分清敌我,把握斗争的分寸和火候,最终通过斗争精神激发团结精神,从而“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四)以革命精神引领政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实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转化,必须以党永葆自我革命精神为前提。历史地看,党对于自身的革命性锻造离不开对现代理性精神的坚守和发扬,并因为现代化任务目标的提高而愈抓愈严、愈跟愈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通过“从思想上建党”、建立民主集中制和发扬“三大作风”使自身成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保持“赶考”精神、警惕和平演变、打击党内腐败和特权现象使党保持了革命党本色;改革开放后,党在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

怎么建设党”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由改革创新精神向自我革命精神的升华,体现了党对自身革命性锻造的新突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将自我革命精神转化为以理想信念为引领、政治整合为前提、务实担当为重点、制度治理为保障的政党治理现代化逻辑。

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以强化使命理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奋斗目标,要通过理论学习、革命实践的催化,使党员干部形成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使客体性的目标设定转化为主体性的使命自觉和责任担当,即将外在的现代化目标进一步转化为强国富民的初心使命。

其次,要加强整合统领以巩固政治理性。党有没有精神力量和革命能力,关键看党的内部是否有一个坚强领导核心。要继续通过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完善相关制度条例,在加强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形成集中的政治纪律,继而形成权威的政治核心,以政治上的向心力消解破坏党内团结的不利因素。

再次,要强调务实担当以推动实践理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实践性飞跃在于真抓实干。习近平多次强调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中要敢闯敢试,不要怕失误担责,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发扬钉钉子精神,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态度把党的政策措施落实好。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求真务实、勇往直前的革命气概。

复次,要强化现代治理以实现制度理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党治理现代化被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框架,要继续通过创新制度伦理强化软性规约、完善制度体系构建硬性规范、落实制度执行实现现实转化、落脚制度效能检验治理结果,把党的革命精神的规范理性通过政党治理现代化传递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中。

作者简介:蒋占峰,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苏东阳,河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中原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摘自《学术探索》2021年第2期)